

# 苏超的文明属性 ——作为礼乐实践的足球新生态

路云亭<sup>1</sup>，周思羽<sup>1, 2</sup>

(1. 上海体育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438; 2. 景德镇陶瓷大学 体育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 要:** 以旅行、叙事与学理的交叉视角, 尝试说明苏超如何将足球的仿猎结构、城市身份、媒介传播和儒家礼乐传统联结起来, 借以构建不同于西方职业足球的本土叙事。作为民间化、城市化与文旅化实践形态的苏超, 并非只是地方赛事的热闹事件, 而是中国足球文化在华夏文明语境中重新命名自身的行动。足球原本带有旅行元素, 其中包括直立行走后人类产生竞争意识的身体动态, 足球的全球传播也是人员的远足旅行过程所致。当下的球迷远征现象同样解释出足球的旅行精神。在西方竞技体育、职业联赛和球迷部落的框架内理解足球, 则会将其视作一种对抗、征服、悬念和胜负的“现代戏剧”。苏超并未取消足球原始狩猎的非确定性因素, 而是通过赛制组织、城市仪式、观众互动、文旅展演和公共话语, 将狩猎性纳入礼乐秩序之中。苏超的实践意义在于它提示中国足球的文化建设不能只移植西方职业足球的制度外壳, 还必须发明能够安顿身体激情、地方情感与公共伦理的叙事规程, 苏超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提供观察现代体育如何被华夏文明重新规置、重新叙事和重新传播的当代样本。

**关 键 词:** 苏超; 文旅精神; 礼乐文化; 华夏文明; 文娛同构; 足球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6)05-0020-07

## The civilizational attributes of Su Chao ——A new football ecosystem as a practice of ritual and music

LU Yunting<sup>1</sup>, ZHOU Siyu<sup>1, 2</sup>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40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intersectional perspective of travel, narrative and academic theory, the present article attempts to illustrate how does Jiangsu City Football Leagues link the imitation hunting structure, urban identity, media dissemination, and Confucian ritual and music traditions of football,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domestic narrativ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professional football. As a practical form of folk,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in the Jiangsu City Football Leagues (abbreviated as SU Chao), Su Chao is not just a lively event of local competitions, but also a narrative action of Chinese football culture renaming itself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ootball originally has elements of travel, including the dynamic body of humans fighting for football after walking upright, and the global spread of football is also due to the hiking process of personnel.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fans' expedition also explains the travel spirit of football. Understanding football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 competitive sports, professional leagues, and fan communities, would view it as a modern drama of confrontation, conquest, suspense, and victory. Su Chao does not eliminate the non-deterministic factors of primitive hunting in football, but also incorporate hunting into the order of ritual and music through competition organization, urban rituals, audience interaction, cultural and tourism performances and public discours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u Chao lies in its reminder that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football cannot only transplant the institutional shell of Western professional football, but also need to invent narrative grammar that can settle physical passion, local emotions, and public ethics, and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at lies in providing a contemporary sample for observing how modern sports are redefined, renarrated, and redisseminated by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Jiangsu City Football Leagues; cultural and tourism spirit; ritual and musical cul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homology; football anthropology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被社会舆论称为“苏超”。苏超一出,旋即引发全媒介传播效应,且在整体上释放出一种喜悦格调。观众看到喜闻乐见的城市联赛,政府看到人气聚集带来的经济效益,江苏各地民众找到群众足球回归后的喜悦心情。苏超越过中国足球原有的生发规制,对中国足协也有所促动。出于体系自洽之缘由,足协对苏超的“越界”举办赛事现象提出了异议,但江苏相关部门认定苏超是文旅项目,苏超也在此语境下与足协撇清了关系,并在文旅事业的叙事体中铺衍开来。在文旅优先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其他省份也在联动,出现了鲁超、赣超、渝超、川超、豫超、东北超之类的新型足球竞赛类别,加上早些时候运营的粤超、浙超,中国文旅界形成了一波“省超”潮流。足球传播到中国已有百余年,新中国参与奥运也有四十余年的历史<sup>[1]</sup>,其根本的价值属性、定位、意义、趋向仍有很大的位移空间,足球的基本定义在欧美国家已经非常明确,而在中国则遇到中国本土文化的过滤,并有在中华文明既有惯性约束下显现出价值重构的可能。文明自有其惯性的延伸力,而中国人所理解的足球总会带有自己文明中的诸多滤镜式元素,中国足球也因此衍生更大的非确定性空间。足球是否属于文化或旅游项目?文旅化的足球是否还具备完整现代竞技体育的品性?苏超式足球退出足协的传统辖区之后,是否扩张了足球自身发展边界?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回应,借以厘清足球学中的相关理论问题。

## 1 足球的生命力建立在人类行旅符号的张力场

### 1.1 从宏观意义上的旅行行为中走来的足球

从行为哲学和物种进化的角度看,足球最迷人的地方不在于它被现代规则规定得多么精细,而在于它始终维持着人类史前运动的基本结构。人类在进入农耕社会以前,长期面对的是不确定的猎物、变动的地形、有限的食物和风险很大的同类竞争。人类为此进化出特别的追逐、围堵、诱骗、协作、爆发、撤退以及守候的技巧,这些动作体系在当时尚属非体育行为,而是真实的生存技术。足球将这些生存技术写意化,并将其提炼为一种动作艺术。球门成为洞穴或归巢点的符号,禁区成为风险很高且诱人的捕食半径,中场

则是迁徙与争夺的广阔地带,边路突破像侧翼包抄,反越位像潜伏者突然跃出草丛的样态。足球的现代性越成熟,它的史前性反而越清楚,规则制定得越精细,便越能显示人类自身被包裹在文明外衣内的运动本能。狩猎与采摘时代的人类行为始终围绕着出猎、远行、探索未知动植物的行为中,他们为获得食物设计出以有效动态为主体的行为范式。

“文旅”一词的重心在“旅”。旅行仍是人类进化当下的核心能力,而足球从其发展早期时就带有超强的旅行性。足球的核心是人与球的偶然性组合,同时也是一种关于飞奔、急停、高速运动、瞬间爆破的身体文化展示体。从人类身体文明演进的角度看,足球是现代世界中的一种最为通俗、密集、古老的身体寓言。英式足球的原点生发于12世纪的带球逐猎游戏,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冲刺、抢夺、占有、快速转移、长途奔袭之类的意义单元。现代足球源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团体,而其规则及其媒介张力则从诞生之时起已发挥作用。作为一种最能反映温血动物本性的抢球文化,足球保留着人类史前生活的身体化记忆。奔跑带球如同远古时代追逐猎物的历史回声,传接配合则是围猎协同的文化余波,射门已成为对人类捕获猎物动作体系的一种抽象,防守则又变成一种对既有领地与食物的护卫行为。足球的狩猎隐喻已将其自身推高到人类高度关注的身体现场。从此以后,足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游戏,而是人类把远古的捕食经验折叠进现代规则体系内的文明装置。在此意义上看,足球场并非草坪与看台的简单组合,而是现代城市的合法化、审美化、媒介化猎场。球员并非单纯的运动者,而是被规则深度浸润的戏仿形狩猎者。大体可以看出,足球是一种需要球员具备高速移动力的文化载体,它将极限移动能力强加在每一个球员身上。苏超的“文旅”属性其实在更原始的平台验证了足球的原初风貌。

### 1.2 足球的传播史学就是一部足球人的行旅史

足球规则统一后,足球便随着踢球者向外扩展,所涉及的是关于体育地理学的诸多面相。Bale<sup>[2]</sup>曾说:“每个人都关心空间和它的发生方式。他们都专注于人们在地理空间中的移动和互动方式;区域构成了体育组织的一个中心特征;地方是识别大多数运动队的

手段;运动体育日益受到物理环境和景观的影响;体育变成了一个领土和等级的世界。”足球的传播也验证其体育化意义维度。1863—1900 年是足球从野蛮游戏转为正规体育项目的关键节点。工业革命后,英国产业工人开始奔赴欧洲各国务工,把足球带到欧洲腹地的工业区,足球从贵族运动转向平民运动。19 世纪末至二战前,足球依托殖民体系、远洋贸易、驻军、海外侨民的四大载体地向全球扩散。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足球的跨界流动。欧洲战场上的士兵相互接触,足球往往成为军营娱乐项目。足球的规则、战术在军人之间快速交流,其中,战俘和流亡人群的跨国迁徙也让足球传播到此前未覆盖的偏远地区。二战结束至 20 世纪末,足球几乎实现全球普及,足球文化也实现了深度迁徙。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的常态化举办使得足球突破地理限制,成为全球共同文化符号。职业足球的跨国迁徙也使得足球具备了人类自然迁徙的新内涵。欧洲五大联赛激化球员跨国流动效率。足球自身长距离传播活动无不以人员旅行为范式。苏超的文旅寓意显然是一种让足球回归自然旅行意义的精神再造过程,并未游离足球本体的意义范式。

足球在中国的传播同样以人员旅行为动力。一是在上海、香港、天津等沿海口岸城市的自然传播阶段,呈现出局部化、纯粹化、自然化的特征,侨民还逐渐构建出自己的俱乐部。此阶段的足球传播虽然大有局部化的特征,但区域范围内的足球水平一度达到亚洲顶端。二是 1949 年后的计划体育阶段。这一阶段的足球达到了专业化时代的最高水准。三是 1994 年的甲 A 时代。这一阶段的中国足球达到了计划体育与自然竞争体系相融合的最高境界。四是足球法制化建设时期。这是中国足球的调整期,也是中国足球腾飞前的重新适配阶段。五是苏超以及后续的粤超、浙超、鲁超时代。它标志着中国足球实现在文化、旅游领域的生存空间重塑过程。足球流入中国始终以人员迁徙为先导,足球的迁徙在任何时段都是隐性或显性的主旋律。苏超的出现意味着足球的旅行属性得以强化。苏超式足球促进省级旅游业,足球自带的旅游属性也在此得到充分展示。

### 1.3 球迷远征的体育旅行学属性

球迷奔赴异地球场为本土球队助威的境况见诸于球类运动中,学界视之为球迷远征现象。球迷远征是体育场域内人口流动、空间互动、文化传播、区域关系重构的具象体现,它融合人文地理、城市地理、文化地理、行为地理等多重维度。球迷远征的主体是球迷,他们跨行政单元、跨地理空间赶赴异地观赛,实现群体性的空间位移。这种人口流动本质上属于体育

人口的短期空间迁移。人们从多个源地向单一赛事场地汇聚,营造出短期的人流洼地。苏超的球迷远征带有区域地理学的属性。江苏 13 城的规模、大小、区位并不一样,城市能级差异明显。一线中心城市的赛场可以辐射周边城市,中小城市赛场的远征人群多局限于周边地缘邻近区域,而远征球迷也参与到体育文化扩散事宜当中。球迷将本土球迷文化、助威文化、地域民俗带到异地赛场,实现体育亚文化跨空间扩散、交融、碰撞。球迷远征属于体育文旅驱动的区域经济空间活动。人流带动赛场城市餐饮、住宿、交通、零售、文旅等产业短期爆发,形成赛事型临时消费经济带。球迷远征并非单纯为球而战或因球出行,而是一种以体育赛事为纽带且串联空间、交通、城市、文化、经济的综合性地理行为,其本质是一种体育情感驱动人口空间流动的现象。足球远征者实现了不为地理条件约束的流动性,流动的人群又反过来重塑区域文化、经济与城市关系。共情理论为足球球迷的远征提供了新的阐释角度。球迷在远征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具有很强的持续性,个体球迷即使在某一个时段不参与远征活动,仍可通过既有记忆能量体验到相关的情感。苏超球迷的旅行以省内城市为单位,展现的是江苏城市群的本土叙事。苏超现象说明,当下城市的足球叙事仍以地理为单位。

常受到成绩波动因素影响,职业俱乐部叙事承载过多的期待值,而以苏超为代表的城市足球则超越为胜负论的既有条框,苏超秩序中的民众可以在地方身份、日常生活和公共参与度之间建立较稳定的情感连接关系,完成了职业足球无法完成的任务。城市不仅是抽象行政空间,还是居民生活、口音、饮食、街区、学校、企业和足球俱乐部的综合体。苏超球迷属于同地域的地方球迷,他们可以有幽默调侃,也有良性羞辱;可以营造主场气势,却不太能制造出对客队的恐惧感。球员也以胜利为旨趣,但不能把失败者排除在合作共同体之外。在此语境中,苏超体系中的每座城市皆因足球而抵达自己最好的状态,都通过足球而被他者看见,其中的核心传播媒介是旅行者带来的“陌生化视野”。

作为文旅项目的苏超仍能体现出江苏省男子足球的最高水平。但是,苏超的其他效益还处在一种待开发状态,其直接经济价值、相关产业带动价值、消费拉动价值、城市 IP 传播价值、地方文化价值、本地民众情绪价值、文体旅融合价值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sup>[9]</sup>。苏超的文旅联动常被理解为赛事经济或消费拉动,但在文化意义上看,它更像是把足球的移动性转化为城市采集路线实验。古代狩猎者追逐动物、采集者辨认

植物,而现代球迷则追随赛程,采集城市风景。球票、车站、酒店、餐馆、景区、夜市、纪念品和社交媒体打卡点,共同构成一条新的城市身体路线。人们因为足球而移动,又在移动中重新认识江苏的城市地理。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提出“跟着苏超游江苏”主题活动,开始将各地非遗民俗、文艺作品、地域美食等资源融入主场展演。苏超主办者已不再满足于把文旅作为比赛附属,而是试图把城市文化作为赛事叙事的组成部分。足球在此成为城市门票,球场成为地方文化的展台,赛程成为旅游时间表。原始的狩猎现象也被重新定义,足球制造的场域已不存在原始猎物,而是一种可体验的现代城市,进而演变为可被分享的地方经验。苏超并未脱离足球本体的意义范畴,而其文旅精神也在足球地理学的意义维度上得以重构。

## 2 礼乐精神的重构实验

### 2.1 把狩猎场改造成礼乐场

足球是一种远古狩猎行为的现代遗存,属于保存人类捕食记忆的文明类型。球员争抢皮球,表面是争夺控球权,深层则是争夺食物、权力以及时间符号。传球是围猎群体在移动中分配风险。射门是捕食冲动在规则边界内的瞬间凝结,扑救动作恰是守门员完成巢穴防卫、领地护卫和群体安全的戏剧场景。足球因而具有强烈原始竞技的意味。现代足球是一种规则共同体,它让现代人在不太危险的情况下体验到追逐、围困、抢夺和得手的情绪结构。作为一种文明遗存,足球并不意味着一种对直观性现代生活的野性复制。足球场域中的球体不是动物,射门不等于猎取,胜利不等于生存。足球变成人类从捕食性动物向文明性动物转化证据。它证明人并未消灭本能,而是把本能转移到游戏、规则和审美体系中。现代足球场是经过“净化狩猎场”,其中没有血腥,却有紧张。没有死亡,却有淘汰。一个城市之所以因足球而被关注,并不仅仅因为有众多球队参赛,还因为它改变了城市的现代编码,这样的城市被媒体、球迷、商家和政府共同编排为可讲述的对象。常态的足球叙事学因此不是足球研究的外部修辞,而是足球文化生成的内在机制。苏超的叙事就带有这样的印痕。

足球传入中国后,其在华夏礼乐语境中如何延伸一直是重要话题。苏超体系通过对仪式、规则、媒介和价值话语的变更将足球的狩猎基因转化为可被城市社会接受的礼乐实践。受到西方职业足球话语结构的影响,中国足球一度出现过成绩焦虑、制度模仿、家长疑惧、球员的社会性身份属性位移的境况。苏超则

另起炉灶,在客观上为中国视域下的新型足球文化提供一种叙事突围的能量。不应把苏超神圣化,更不应将地方赛事夸大为完整制度模型。作为一种人类礼仪文化的展演过程,苏超是一种被中国固有文明重新编码的娱乐方式。

将苏超置于体育人类学的视域下可以更好发现其当代价值。西方学界从游戏、仪式、阶层、暴力、球迷部落和身份政治等角度展开。Giulianotti等<sup>[4]</sup>关注球迷身份、全球化消费以及地方归属问题,足球被解读为现代社会的身份生产器。上述观点丰富足球的文化解释维度,但其核心仍构建在欧洲职业足球经验上,倾向于把足球写成现代民族国家、城市阶层和商业媒体共同建构的对抗景观。苏超有一套自我设定的仪式叙事,可以将比赛日改造成城市节日,把球场改造成礼俗空间,把观众改造成共同仪式的参与者。苏超的仪式与传统的足球赛事不完全相同。赛前入场、奏唱、握手、城市标识展示、地方文化暖场、非遗民俗表演、主客队互动以及赛后致谢都在把足球从纯粹竞技中拉出来,放入更宽的礼乐秩序当中。这种仪式叙事的关键并非增加一些表演性节目,而是改变观看者理解足球的方式。狩猎式足球场上,假定性的陌生群体争夺猎物,其中的失败者被排除在场域之外。礼乐场中的群体虽然也在竞争,却在假定性情境内外都承认对方也是仪式共同体的一部分。苏超的主客场相遇因此具有礼尚往来的意味。置此语境,客队已从来犯者变成来访者。主队也从单纯守土者更换为待客者,观众不是只负责制造敌意的部落成员,而是城市形象的身体代言人。足球的自然竞争的元素被保留在90分钟的追逐中,但它的外缘则被一种源于远古的礼仪文化重新包裹。

从人类学角度看,苏超竞技过程相当于把原始足球的猎物争夺现象转化为“礼物交换”的象征性竞争。原始围猎需要群体协同,但也可能激发排他性和暴力,足球因而保留下了协同性与对抗性的双重特征。苏超的主体性意义则别有显现,它通过礼乐文化让对抗成为一种社会礼俗从而部分跃出了竞技礼俗,这也是苏超最终与足协诉求完全和解的缘由。这样的语境带有很强的中华本土文化元素。握手礼、谢场礼、文明观赛倡议、主客场互赠、城市之间的网络调侃都是对足球原本的狩猎隐喻的缓冲器。它们告诉参与者,人类可以追逐于各种场域,但不能把对方还原成敌人。礼仪功能正在这里显现。竞技体育从来无法摆脱多巴胺情愫的介入,礼也并非对激情的反叛,而是为激情装上新的边界符号。苏超的历史定位也体现于此。

### 2.2 规则叙事对中庸节制的制度化表达

如果仅从狩猎文明解释足球,仍不足以理解足球

在中国的延展轨迹。足球在中国的发展一定要受到华夏文明内在精神的制约。华夏文明长期以农耕、定居、节律、礼俗和家国秩序为中心,其身体观相对中庸化,不崇尚无边界的野性爆发力,而偏向于节制、调和、稳定和可持续性的精神。现代足球来自高度强调不确定性的“仿猎结构”,而农耕文明追求的是季节、秩序、收获和可预期性。狩猎者在随机性中寻找猎物,农耕者在周期性中等待作物。狩猎者崇拜冒险,农耕者珍视安顿。狩猎者以瞬间捕获证明能力,农耕者则以长期照料植物的内在态度来证明其德性的厚薄。

足球进入中国,便进入这种文明张力之中。西方职业足球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把非确定性推向极致。弱队可能爆冷,最后1分钟甚至1秒钟可能实现胜负逆转,个体天才可以突破群体的围猎,撕裂集体的防线,成为一种主宰者。球迷情感因此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剧烈摆荡。华夏礼乐传统更关心电流如何不击穿外在的共同体?激情如何不转化为暴戾?胜负关系如何不遮蔽德行?城市荣誉如何不变成地方相轻的现实叙事?

足球把本源性的冲动转化为可共处、可观赏、可教育、可传播的公共仪式。因此,苏超的意义不应只被理解为地方赛事流量的成功事件,而应被理解为足球进入植物文明、农耕文明和礼乐秩序后的道德规训过程。它既不彻底压抑狩猎性,也不完全崇拜狩猎性。它让城市之间可以实现自然竞争,却也可以通过地方调侃、主客场礼仪、文旅联动和公共传播降低敌意。它保留比分,却又用展演、消费、非遗和城市游赏扩展比赛的意义半径。足球在此不再只是追求胜负的机器,而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节庆容器”。

苏超从一开始就在追求本土化的规则叙事。现代足球本来就是规则的产物,越位、犯规、红黄牌、换人、补时、竞赛规程等制度构成了足球文明化的基本条件。苏超是城市业余足球联赛,其规则叙事还有更强的公共治理色彩。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提出,在总结2025赛季竞赛工作的基础上,赛事编制竞赛手册2.0版本,涵盖竞赛组织、赛风赛纪、球队权益、场地管理等内容,并修订场地规范。这些举措看似技术性的安排,实则是在讲述一种文明竞技的故事。足球可以热烈又可暖心,城市可以争荣誉且守秩序。民间力量可以进入足球领域,而一切皆在公共规则体系内融洽并存。儒家中庸并非平庸,投射于足球,亦非一种无分胜负的绝对平局,而是一种对过强力量的约束机制,其目的在于防止高强度竞争使足球走向失控局面。苏超规则叙事的价值在于尝试在想赢与会赢、争胜与守礼、城市荣誉与公共秩序之间建立平衡。西方职业足球常以高强度对抗、极限压力和

绝对胜负制造叙事张力,而苏超则更强调民间参与、城市互识和文旅共享,其规则不仅服务于比赛结果,更强调足球转化为城市公共生活有机元素的可操作性。这种规则叙事不一定比职业足球更高级,其文明性目标亦非刻意将球员推向商业竞技模式的尝试,而是把足球放回地方社会的可持续循环体系。

### 2.3 从胜负机器到城市共在的价值叙事转型

礼乐文化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一整套处理身体、情感、秩序和共同体复杂关系的技术。如果说礼是一种身体交往边界符号,那么,乐则是一种和睦情调的调和剂。二者联袂构成华夏文明处理竞争、欲望和群体情绪的基本范式。与足球的狩猎寓意一样,射箭一度是西周以后的狩猎文明筹码,西周射礼最能说明这一点。射本源于狩猎与战争,却在礼制中被转化为观德之术。射者并非只追求命中,而要在揖让、进退、容体、节奏和音乐中显露修养。射箭行为也是一种行仁之道,其要义在于把可能指向杀伤性的技术转化为德性元素。苏超就集成了射礼中的基本精神。苏超也会涉及竞赛,但已改变竞争的终极意义。胜负的悬念仍然存在,但不再是唯一真理。命中球门仍很重要,但命中球门必须通过身体姿态和礼仪秩序显示正当性。苏超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叙事。现代足球极易被胜负逻辑吞噬。在此语境中,赢者拥有话语权,败者成为人们谈论的材料。冠军被永久纪念,失误被无限回放,成为一种失败者的符号。这种逻辑可以构建出竞技体育的魅力,而苏超的重要性恰在于它把足球的价值从胜者为王的原则扩展为谁被看见、谁在参与、谁与谁发生关系之类的貌似边缘性的话题。江苏的13城成为叙事主体,球迷成为传播主体,文旅成为外溢场景,地方文化成为内容资源。苏超揭示出另外的人类生活寓意,其中不乏烟火气以及本土化的人文精神。

如果没有大众媒介的广泛支持,苏超仍是一种规模不大的地方赛事。进入短视频、社交平台、新闻报道和城市宣传的联合矩阵之后,苏超才成为全国性话题。体育传播学的意义在此得到扩展。苏超的破圈并不仅仅因为媒介放大了比赛,但媒介为苏超重组意义结构。在传统的电视时代,足球叙事围绕直播画面、解说话语和赛后评论展开。短视频时代的足球则被拆解为看台片段、城市梗、球迷表情、地方美食、交通体验和赛前赛后花絮。比赛本身仍是中心,但中心会不断向外扩散,形成多层分解的叙事环节。这种媒介叙事具有集体交际的功能。现代媒介使地方礼俗得以跨城流动,构建出一种更为广泛的民族共同体。一个城市的观众可以展示一种独特的欢迎客队的方式,而另一个城市的球迷则可以以幽默回应,而无需凭借高

强度的竞争产生信任感。如将一段非遗表演如何嵌入中场,其中的一句地方口号也会变成全国热梗,这些细节都会把礼乐精神从球场内部带到网络公共空间。

### 3 地方叙事中的共同体建构

#### 3.1 媒介成为短视频时代的礼乐扩音器

有关报道指出,2025年苏超在端午假期吸引大量球迷涌入主场观赛,并带动文旅消费与城市热潮。这种现象说明,苏超并非传统意义上单一体育赛事,而是一种竞技、传播、消费和城市认同的复合体。观众在看球,也在阅读城市。城市在办比赛的同时也创立节日。球迷支持球队,同时也在消费地方叙事。足球场域中的猎物已不再只是球门里的进球,还包括注意力、城市形象、旅游路线、地方特产、社交媒体之类的话题。捕食行为在这里被转化为更具动态感的采摘行为,人们采摘的不再是果实,而是故事、情绪、照片、短视频和纷繁的城市记忆。这正是苏超区别于职业足球的标志。职业足球把球迷的情感高度绑定于俱乐部的胜负变迁表格,苏超则把球迷情感扩展到城市生活世界。苏超几乎颠覆了既往城市的本体寓意。一个城市即便输球也可能因主场氛围、城市性格、旅行价值和公共礼仪而赢得大众的好感。一场比赛即便比分平淡,也可能因地方展演、民间聚会、看台互动和网络叙事而成为公共事件。足球的价值叙事开始从结果中心论转向过程中心论,从冠军中心论转向参与中心论,从竞技资本论转向文化资本论。

短视频平台上的苏超并非碎片化娱乐,而是一种现代聚会“文明扩音器”,它让城市之间的民众在观看中互相产生信任感,人们放弃极限对立情绪,可以在调侃中保持边界,又在竞争中维持亲和力,而无需将现实张力扩至极限。媒介有其自身的追求,它也可能放大冲突、制造标签,进而刺激地域对立。与鼓励极限竞争的足球不完全形同,苏超聚会叙事的难点在于如何让媒介热度不反噬公共伦理。这也涉及城市性格中的诸多细节。如果城市调侃滑向更为严重的羞辱性表演,如果球迷热情滑向敌意的谩骂,如果流量竞争压倒了赛事秩序,聚会场的温和功能将很快退化为原始竞技场,但苏超规避了这些现象。苏超的媒介治理不仅在于追求传播效果,更在于塑造可持续的叙事尺度,它使得温和有序的传统伦理精神再度成为一种民间话题。苏超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种城市文化叙事体系的新样态。

#### 3.2 地方认同的区域共同体的张力

城市足球天然会激发地方认同感。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南通、常州等城市以城之名参与赛事,

这也意味着江苏内部的地方差异会因足球而重新成为媒介亮点。其实,地方差异感是苏超魅力来源,但也可能成为风险来源。地方认同如果只朝向自我夸耀的方向演变,便极易成为一种单向度的自我话语形态,本土竞争也会朝着本土话语的方向递进。从学理互动的角度看,如果城市文化缺乏民族志元素的加持,便可能会伤害到区域共同体的融洽性。因此,苏超的最高叙事不应是突出某个城市的优胜感,而应是对江苏的整体性本土精神施行延伸性重构。城市与城市之间可以争胜,但这种争胜也仅仅服务于区域文化的连带感。成熟的苏超叙事应当让每座城市都有被讲述的机会,而非孤立地讲述单一性的地方话语。苏超的地方均衡性价值也就此显现出来。苏超可以让胜者获得掌声,也可以让败者不失尊严,每一支客队的球迷也会像走街串巷的访客一样,会在不同场合获得客人般的仪式性欢迎。唯有如此,苏超才能把地方身份从排他性领地转化为互相观看的欢乐共同体。

乡土叙事一直是苏超的特征。乡土传统并非一种抽象的经典制度,它需要日常化、细节化、实体化元素的支撑。苏超可以假定作为一种乡间化的宴饮空间,这便构建出一种行旅、会集、歌舞以及共同围观的全新舞台。苏超把球迷从屏幕前带到城市中,又将城市从行政区划带到身体经验中,它使得足球成为地方社会重新聚集的新型媒介。乡土聚会的情景在足球的促动下闪现出新的意义维度。人们在看球之余吃一碗饭、走一段街、听一段曲、拍一张合影,这些看似琐碎的行为恰是现代都市民族志中的日常化形态,更是苏超精神的基本反射。

#### 3.3 苏超体系的人类学价值

江苏的文化主体上分为苏南、苏北两大板块,依照传统城市风格学来描述,苏南秀美、苏北雄放,这种差异在苏超的实践空间产生了同一化、相聚化、融合化关系。足球源于陌生化的英国文化,而苏超所复兴的是一种本土文化。苏超就此成为一种文明规训与样态移植的新型样本。依照传统体育社会学的原理,任何一种规训文明都有其对野性的压制意义,仿佛规则越多,身体便越文明,而体育则将野性当作一种自我化的身份标志,其中不乏纯粹的身体释放元素,仿佛越粗粲、越拼抢、越接近本能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性。苏超提供了第三种可能。身体的激情可以被保留,但必须被公共礼仪、城市伦理和媒介叙事重新组织,它们受到了结构化、类型化、同质化处置,变成了一种新型的文明元素。苏超也在遵循足球的本体规律,源于英国地域文化的足球的狩猎冲动元素并未在苏超的赛场上消失,它在冲刺、拼抢、射门和看台呐喊行

为中仍旧会闪现出其既有的能量,但是,苏超体系中的这种冲动不再指向破坏,而被转化为一种城市之间的象征竞争和情感互认。

当传统的英式足球失去了在我国顺畅增长空间之后,苏超便应时而起,其温和有度的做派与华夏文明的中庸之道契合。苏超把足球放入城市节庆和地方文化之中,恰好使足球的原始狩猎属性获得了新的安置。苏超并不排斥反复无常的行球律则。如此赛事中的球员依旧可以像猎手一样自然地奔跑,但不能像无序运动者那样给他者带来威胁。球迷仍旧可以像远古部落战士一样有归属感,但不能像仇敌一样遭到排斥。城市可以像领地一样被热爱,但不能将其变成无序化竞争的猎场。因此,苏超在体育人类文化学方面的意义要大于竞技学本体的意义。苏超把足球原始狩猎的隐喻推进为由礼到乐的进展场域,使足球的狩猎隐喻的外延得以扩展。如果说竞技性足球强调足球的史前原体精神的话,苏超则强调足球的文明转化性。足球如果仅仅停留在纯竞技层面,其乡土文化感会降低,人类会陷入单向度的精神沉迷语境。苏超现象旨在说明,不同的文明可以完好处于同一种身体意义共同体中。

苏超已成为媒介新生力量。苏超呈现出对传统足球赛事的刷新意向。苏超的看台人流如潮,赛事流量扩充明显,城市话题得以延展,苏超将足球从职业俱乐部的貌似专业性、封闭性与垄断性的消费空间中转移,将其重新安置在城市、民间、节庆、文旅和地方身份的网系中。苏超的文旅精神包括看球赛和逛江苏的寓意,它以足球为纽带,人们可以在一次联赛中逛遍江苏13城,进而深度体验城市文化、地域风情与全民烟火气的整体化景观。苏超旅行的寓意仍很明确,它以足球为媒介,串联起13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将风情画面、烟火场景乃至烽烟容纳在同一种动态体系中。人们可以在竞技与欢笑中读懂城市精神,其所收获的是看球、旅行、文化、社交的复合性体验。因此,苏超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与普通的足球赛事相异的特征。苏超所呈现出来的足球赛事不只是两队争胜的球类竞技,还构建出一种城市之间互相观看、互相戏谑、互相承认的礼俗剧场。这就为足球学界提供了一系列令人思考的问题。

苏超并未简单复制西方足球模式,它在华夏礼乐

文明的深层结构中重新安排了足球的狩猎基因。苏超把野性纳入边界,把竞争纳入礼俗,把胜负关系纳入城市文化共同体,把赛果纳入文旅传播的范围,又将地方情感纳入公共伦理的秩序结构中。足球可以成为文明规训与陌生文化自然融合的当代样本,并在仪式、规则、价值、媒介和文旅之间形成本土化叙事。苏超现象可以说明很多问题。首先,地方赛事可以重新构建共同性的注意力,借以修复城市公共生活的情感通道。其次,足球的中国化现象不只体现在训练体系、竞赛体系和职业体系的中国化改造层面,更是身体意义、观看伦理和公共叙事的中国化完型形态。华夏文明视域下的新型足球文化也就此显现出来。再次,苏超并非一种将足球变成温和无争的礼仪表演,亦非将礼乐文化降格为简单的体育赛事包装品,苏超承认足球的狩猎性、动物性和非确定性,又用礼的精神来划定新边界,它用乐的精神来调和情感,用城市空间承载现代人的身份,用新型媒介来扩展赛事的传播,用文旅精神延长足球文化的存在半径。最后,苏超在自然联动过程中形成的苏超体系带有背景深厚的华夏文明的基本密码。它以礼乐文明为基本的节奏中枢。苏超仍旧可以制造胜负感,也可以生成共享联动合一的文明形态。当中国的礼乐文化再度成为足球文化的导航器的时候,足球变成一种足以体现其中国文化旅行的特别文化类型,苏超由此变成新型文明的融合形态。

### 参考文献:

- [1] 谭广鑫,刘露,段锐.中国夏奥征程40年的历史回顾、未解难题与前瞻思考[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05,49(6):38-49.
- [2] BALE J. Sports geography [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3: 2.
- [3] 任华,鲍树洋.群众性体育赛事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基于“村超”与“苏超”的类型化比较[J/OL].体育学刊,2026-06-05,10.16237/j.cnki.cn44-1404/g8.20260604.002.
- [4] GIULIANOTTI R. Football: A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gam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 [5] 周思羽,孙文波,路云亭.群众体育赛事促进“体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以“苏超”为例[J].体育学刊,2025,32(5):24-30.